



诈骗罪中被害人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

——以债为例

王 晓,谢卓延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诈骗罪中被害人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需从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关系出发,确认财产犯罪行为对象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根据物理管理可能性说及债本身的特征,可判断部分原权之债属于财产性利益。构成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需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考察其是否存在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处分行为主要表现为被害人利益损失时行为人或者他人利益的增加。在诈骗罪的构成中,被害人的处分意识是连接行为人欺骗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行为的重要依据,需判断被害人对处分行为是否具有相应的处分意识,在对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形中,被害人对超出的范围不存在处分意识;在对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形中,被害人具有处分意识。

关键词: 诈骗罪;财产性利益;处分行为;处分意识;债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04-0246-07

Determination of the victim's disciplinary action of property interest in fraud: Taking the debt as an example

WANG Xiao, XIE Zhuoya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victim's disciplinary action of property interest in frau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erty interest and the "property", so as to ensure whether the "property" is the object of the criminal act of property which includes the property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physical manage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bt itself, it can be judged that part of the original right of the debt is a property interest.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victim's point of view for fraud composition of property interests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disciplinary awareness. Disciplinary ac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oss of the victim's interests wh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rpetrator or others increase. In the composition of fraud, the victim's disciplinary awarenes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necting the perpetrator's fraudulent behavior and the victim's disciplinary 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victim has disciplinary awareness of disposition;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of the property interest, the victim does not have disciplinary awareness to the exceeding scope;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terest, the victim has disciplinary awareness.

Key words: fraud; property interest; disciplinary action; disciplinary awareness; debt

收稿日期:2024-07-28 网络出版日期:2024-12-31

基金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2024R406B080)

作者简介:王 晓(1967—),男,杭州人,教授,主要从事刑法学、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财产的存在形态日趋多样,如何认定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诈骗罪的行为对象是“财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尚未明确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财产性利益亦未形成统一认识。例如,在湖北杨某诈骗案中,法院认为诈骗罪的对象不包含财产性利益^①;而在云南黄某诈骗案中,财产性利益被视为财产^②。鉴于司法实践的现状,理论界试图厘清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联系:有观点从事务管理可能性出发,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范围^[1];亦有学者提出,财产性利益只有在具备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价值性时才能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2]。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对财产性利益能否成立诈骗罪存在争议。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多数案例主要围绕债进行探讨,故以债为载体、明晰财产性利益与诈骗行为对象的关系将有利于解决现存的疑难问题。

作为一种交互型犯罪,诈骗罪强调被害人的作用。财产性利益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在诈骗狭义财物的场合,行为对象在物理意义上具有实体,占有转移可视且明确。但财产性利益属于观念上的利益,占有转移的过程无法被肉眼观察。因此,相比于狭义财物,被害人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以目前多数案例中出现的债为例,处分行为意味着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相应的,对于被害人的处分意识,需借助特定的要素,判断其是否存在认识错误。

综上,本文拟将债作为典例,展开诈骗罪中被害人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研究。首先,明确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关系,并针对债进行分类讨论,以确定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对象;其次,再从被害人视角出发,阐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之本质;最后,结合财产性利益的特性与处分行为的表现形式,根据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范围、价值的认识判断其是否具有处分意识。

一、部分原权之债作为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行为对象

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财物”是诈骗罪的行为对象,若要成立本罪,财产性利益应当包含于财物之中。故本文将从刑法对财产的保护目的、刑法与民法的关系角度出发,确认“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区分财产性利益与狭

义财物的要素,以验证债属于财产性利益。鉴于债本身具有多种类型,需考察各类型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合理性。

(一)财产性利益属于诈骗罪中的“财物”

诈骗罪中的“财物”是广义的财物,包含了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体系虽然对财产性利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直接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诈骗罪的行为对象范围之外是不妥的。《日本刑法典》中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具体分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在同一罪名中为财产性利益设置了独立的条款^[3]。《德国刑法典》并未对财产性利益作出直接规定,“物”这一概念用于指代有体物^③。根据德国学者的观点,“财产”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涵盖了人类社会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4],不具有物理属性的财产性利益可被归纳到“财产”这一范畴。透过德国、日本的立法例可以发现,两国刑法主要以“有体性”标准来区分财产性利益与狭义上的财物^[5],有形的是狭义财物,无形的是财产性利益。

反观我国《刑法》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对于财产犯罪对象的规定统一使用了“财物”一词,没有明确规定财产性利益在财产犯罪中的法律地位,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诸多争议^④。为确定财产性利益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定位,可从下述角度出发,肯定“财物”涵盖财产性利益。首先,从刑法的保护目的来说,财产犯罪所指“财物”是广义上的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侵犯财产罪”一章设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各种财产利益。目前财产有以物理形态存在的、可被观测并控制的“物”,也有如债这种仅存在于观念上的利益,若“财物”仅仅指代前者,则不能有效保护公民的利益。换言之,财产犯罪中的“财物”与

① 具体案情及裁判理由,参见(2019)鄂0104刑初133号判决书。

② 具体案情及裁判理由,参见(2018)云0381刑初380号判决书。

③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2条与第249条规定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限于“动产”(或“可移动的物品”),在263条规定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为“财产”。参见:王骏.刑法中的“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J].清华法学,2016,10(3):39-56。

④ 如有学者认为,从实质合理性角度出发论证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罪对象的观点并无不妥,但既然刑法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目前阶段在解释论上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参见:童伟华.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财产罪的法益及其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4-108。也有学者认为,作为财产罪对象的财物,有的包含财产性利益,有的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在立法论上,我国刑法体系并未对财产性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从罪刑法定主义出发,明确规定应当更为合理。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8。

广义上的“财产”是相同的概念,而“财产”一词具有多层含义,可以指人们对物所享有的所有权,也可以指物和权利的总和^[6]。无论是“财物”还是“财产”都主要侧重于“财”的部分^[7],即某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其次,从民法与刑法的关系角度来说,财产性利益是刑法的保护对象。刑法具有保障性,在其他部门法不能够遏制某种违法行为时,刑法需要对该利益进行保护。进言之,财产遭受损失时,公民可以通过民法的途径进行救济,在民法的救济手段失效时,刑法是有效保障。若刑法中的“财物”不能涵盖财产性利益,公民财产利益将难以得到保护。

综上,虽然我国《刑法》未如日本、德国刑法对财产性利益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规定,但将财产性利益视为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仍然存在合理性。刑法所保护的财物是广泛意义上的财物,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财物,也包含了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对于“财物”的保护更注重其“财”的属性;并且刑法作为保障手段,在通过民法难以救济的情况下需对财产进行保护,因此诈骗罪中的“财物”应当包含财产性利益。

(二)财产性利益是不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财物”

诈骗罪中的“财物”与广义上的“财产”可以视为相同的概念,“财物”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狭义上的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之所以要提出判断财产性利益的标准,是因为财产性利益相较狭义财物,无论是存在形态、占有方式,还是转移的表现形式都存在差异,有必要针对二者进行区分。

国内外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通过各种路径试图对财产性利益的特征进行归纳,用于区分财产性利益与狭义财物。德国和日本的通说从有体性出发,认为财产性利益是指不具备物理形态的利益^[8]。该学说较为直观地区别了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但是其标准陈旧,在现代社会中不能很好适用:以电能为例,其价值与本身密不可分,电能被损耗时,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灭失,人们可以通过仪器检测、显示电能,但电能本身不具备物理意义上的形体、无法被人类直接观察到,故该区分标准不适用于财产性利益的判断^①。国内有理论主张以经济价值作为界定标准来判断某利益是否属于财产性利益,但该学说的支持者对其核心标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围绕不法利益的“经济价值”产生了分歧^[7,9-10],因此“经济价值说”不能适用于判断财产性利益。

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判断标准需从其与狭义财物

的差异出发,抽取出二者最关键的不同点作为区分。可以通过物理管理可能性对二者进行辨别:首先,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在物理属性上存在差异,狭义财物是于物理意义上真实存在的,而财产性利益是一种观念产物,不存在实体;其次,狭义财物的转移与财产性利益的转移方式存在差异,前者转移的流程有迹可循,如动产的交付、不动产的登记,但后者的转移方式并不能被物质性地观测到,表现为观念上的利益获得或者丧失^[8]。换言之,狭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能否通过物理的形态对其进行管理。这样的判断方式既弥补了德国、日本“有体性说”在区分上标准过于简单的不足,又体现了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在占有、转移行为构造上的差异。

综上,当某种财物能够通过物理的形态存在并被人管理,包括后续对其转移,则认为其属于狭义上的财物;反之,当某种财物无法以物理的形态存在且其本身不能发生物质性的转移,则应当认为其属于财产性利益,即财产性利益是不具备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财物^②。

(三)部分原权之债属于财产性利益

当下多数诈骗财产性利益的案件与债相关,将债作为典型的财产性利益进行研究有益于司法实践。债具有财产属性,不以物理的形态存在,其本身不能发生物质性的转移,诸如债权转让、债务承担等方式都是在观念上对其“转移”,根据物理管理可能性说,债属于财产性利益,能够成为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债的内容众多,且分散在“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中,若笼统地将所有类型的债视为财产性利益,有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之嫌,故有必要从债的类型入手,限缩其作为财产性利益的范围。

根据债的发生原因,可以将其分为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基于当事人的合意形成的契约是意定之债;基于法律规定而形成的准契约则是法定之债^[11]。民法中请求权可以分为两种:作为原权的请

① 我国民法认为“物”具有四个特点:不包括人的身体、能够为人所支配、必须独立为一体和以有体物为限。至于电气及其他自然力,只要能够被人控制并作为生活资料的,均属于物。参见: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十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0.

② 在此可以明确刑法中“财物”相关概念的边界。刑法中的“财物”是最广义的财物,其中,能够在物理上被人为控制、管理的有体物或者无体物均属于狭义财物的范畴;而不具有物理形态、无法从物理意义上被人控制的利益属于财产性利益。

求权和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后者是在原权受到不法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风险时而产生的救济性权利^[12],可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由前者派生而来的,故根据请求权将债分为原权之债和救济之债。依照上述两种分类方式,大致上可以将债分为原权性意定之债、原权性法定之债、救济性意定之债和救济性法定之债。

如前文所述,救济之债必须有对应的原权之债才能存在,为遭到不法侵害的原权提供帮助。当原权受到侵害,救济之债是权利人保护原权的救济手段,若义务人不履行救济之债,会使原权实现受到阻碍,最终侵害的仍是原权本身,而不是救济权。刑法具有补充性,当民事的救济手段无法保护权利时,才应使用刑法对其进行保护,救济之债在其中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质言之,救济之债处在原权之债受到侵害与刑法介入的中间,用以证明保障原权的民事救济方法无效,需要刑法规制犯罪行为。故在刑法上,救济之债本身并不具备单独的保护价值,不纳入财产性利益的讨论范围。

原权性意定之债是民法中最为常见的类型,目前刑法实践中争议最少的财产性利益便是这一种类型的债,其规定集中在民法典“合同编”的部分^①。债的产生、变更、消灭是基于财产主体的自由意思,在涉及这类债的财产犯罪中,行为人恰是侵害了财物本身和处分人的处分自由,故原权性意定之债属于财产性利益。

原权性法定之债在我国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民法典“准合同”部分的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二是由其他民法规范所规定的请求权,如抚养请求权和赡养请求权等^[13]。其中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虽然由法律规定,但其具有合同的部分特征,履行与解除都基于主体的自由意思,与原权性意定之债接近,可以认为其属于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以抚养请求权和赡养请求权为例的原权性法定之债规定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中,这两种请求权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亲属权利,其效力源于人身权利,不具备财产属性,故不能纳入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债根据不同的标准能够划分为四种类型,两类救济之债仅作为刑法介入的前提条件,原权性法定之债中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更贴合主体的自由意思,最终能够归入财产性利益的债被限定在原权性意定之债与部分原权性法定之债。

二、诈骗罪中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

通常认为,诈骗罪成立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受骗人基于该欺诈行为产生了认识错误并因此处分财物,从而使行为人或者他人取得该财物,同时被害人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9]。这意味着成立诈骗罪需要存在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而在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彼此关联的诈骗犯罪中,被害人认识错误的地位举足轻重^[14],因此在诈骗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对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的分析应从被害人视角切入。在明确财产性利益能够成为诈骗罪行为对象的基础上,要成立诈骗财产性利益,就需要先对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作出认定。财产性利益不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其转移方式并不像狭义财物的交付那样有迹可循,而是以观念上的变化为主。目前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债这一财产性利益频繁出现,因此本文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的分析将以债为例展开。

(一)处分财产性利益行为的类型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中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与民法上的“处分”存在区别^②。民法上的处分是所有权的权能之一,属于物权意义上的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在法律上决定了物的命运,进一步可分为对于所有物本身的处分或者对所有权部分权能的处分;二是在事实上决定了物的命运,通过事实上的行为使所有物的性状发生改变^[15-16]。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相较民法意义上的处分则更为宽泛,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自愿地通过自己的行为损害了财物,便可以说对财物作出了处分行为^[17]。对狭义财物的处分行为直观地表现为财物占有的转移,而财产性利益不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本身并不能为人直接感知,取得财产性利益的方式与取得狭义财物存在差别。故使用处分狭义财物的“占有转移”来描述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显然不妥,有必要根据财产性利益自身的特征勾勒其处分行为的轮廓。此处对于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分析以债为例,债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有债权则有相应的债务,有债权人则有相应的债务人,因此诈骗罪中处分债的不同行为类型均可以从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两个方

① 原权性意定之债是由财产主体基于意思自由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偷逃餐费、住宿费、高速公路费等行为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属于原权性意定之债。

② 我国《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面进行分析。

民法上有关债的行为可以区分为“债的产生”“债的变更”和“债的消灭”,对于债的处分行为据此将被分为三种行为类型。第一种类型表现为债权、债务的设立以及债权人、债务人权利义务的产生。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诈对债产生认识错误,从而自愿设立债权债务关系,并成为该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务人,对行为人或其他人履行相应的义务。例如,甲欺骗乙有一笔债未还,乙以为自己确实欠甲钱而自愿与甲设立该债,并向甲支付相应的“欠款”。当债被设立时,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形成,行为人有理由期待被害人实现履行债务,而被害人也自认为有义务向行为人支付相应的“欠款”,双方的利益已经在观念上发生了增加和减损。因此在这一类型中,处分行为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并且被害人将作为债务人。

第二种类型表现为债权转让、部分转让或债务承担,以及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变更。此类型之下,债权债务关系未消灭,但是债权人或债务人发生了变化,被害人基于行为人欺诈行为产生的错误认识而做出的处分行为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被害人受到行为人欺诈,基于认识错误主动将其债权转移或者部分转移给行为人或其他人,并且债权人从被害人变为了行为人或其他人;二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自愿承担对行为人或者他人的债务,被害人代替了原债务人的位置。无论是将债权移交,还是承担来自他人的债务,都已经使被害人的利益发生减损,因此在这一类型中,处分行为可分为被害人转让债权或承担债务。

第三种类型表现为债权、债务的消灭以及债权人、债务人权利义务关系的终止。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免除行为人或者其他人对被害人的债务,该部分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比如,甲向乙借钱,后续又以“做生意失败”为由向乙请求免除债务,乙同意并消除了该债权。被害人在做出意思表示放弃对行为人或者他人的债权时,该部分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行为人或者其他人不需要再履行对被害人的债务,而被害人同样也丧失了对行为人或其他人享有的债权。因此在这一类型中,处分行为即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并且被害人是原债权人。

(二)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本质即利益转移

在上述类型中仍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被害人处分行为的完成究竟以被害人做出意思表示完成债权债务关系建立的节点为准,还是以被害人履行完

相应的债务为准。狭义财物处分行为的完成主要以交付为准,是因为其在物理意义上能够被管理。而财产性利益并不具有这种属性,其仅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即便代表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合同被毁损,债权债务关系实质上也并未消灭,因此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并不需要以类似债务履行完毕的形式为准。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形成了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形成之时,被害人本身已经接受了“财产将要损失”这一观念,在未发现受骗的情况下,被害人将始终背负债务直至该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债务履行与否均不影响这种观念上的利益损失。故处分行为主要应当考虑的是使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行为。

基于上述债关系变化的类型区分,可以发现诈骗罪中对于债的处分行为主要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产生、债权或债务转移以及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其中被害人总是处在利益受损方,即失去债权人身份或成为债务人。因此,通过对不同类型债的处分行为的研究可以得出,在诈骗罪中对于债这一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之本质是利益转移。换言之,当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对财产性利益实施了相应的行为,从而使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就可以认为财产性利益已经发生了转移,处分行为已经完成^[18]。

此外,从行为形式的角度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进行分析,处分行为既包括作为的形式,也包括不作为的形式^[19]。例如,行为人通过作弊使电表读数变小,将小的示数给抄表员看,而抄表员基于错误的认识按照小的读数收费,没有意识到被隐瞒的部分。此时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存在认识错误,但作出的处分行为本身没有问题。这里涉及两个部分的债,一是小读数所代表的债,这部分债完整实现;二是被隐瞒的差额部分所代表的债,该部分的债因为被害人“未察觉”的放弃而消灭,质言之,被害人未阻止行为人取得利益,对这部分的分可以视作不作为的处分行为。

综上,被害人对于财产性利益处分行为的本质是利益转移,在行为人或者其他获得利益时由被害人承担利益损失。在债权债务关系中,有更为具体的表现:一是债权债务关系产生,被害人对行为人或者其他产生新债务;二是债权或债务转移,被害人转让债权或者承担来自行为人或其他人的债务;三是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被害人对行为人或者他人的债权消灭。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可通过作为的形式,也可通过不作为的形式。

三、诈骗罪中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意识

在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是基于自身的处分意识做出的,但此语境下的处分意识往往已经受到行为人欺诈行为的不当引导,因此被害人的处分意识在判断行为人是否成立诈骗罪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判断被害人已经做出了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后,有必要确定其是否存在相应的处分意识。

(一)前提确证:处分意识的必要性

有观点从德国立法例出发,认为诈骗财产性利益无需判断处分意识的有无^[20],该观点存在一定误区。德国刑法规定的盗窃罪和诈骗罪行为对象不一致,盗窃罪的对象局限于狭义财物,诈骗罪的行为对象既包括狭义财物,又包括财产性利益。仅讨论狭义财物的情况下,处分意识的存在能够区别盗窃罪和诈骗罪。鉴于德国刑法规定对财产性利益只能成立诈骗罪,其前提是对于财产性利益存在处分意识,当被害人不存在处分意识且财产性利益已经被侵害时,便无法对财产性利益予以保护。对于财产性利益的保护困境使得德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放弃了对处分意识的要求。我国刑法体系中,盗窃罪和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为广义上的“财物”,包含了狭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存在德国刑法所面临的困境。

学界通说认为,被害人出于自身意思作出财产处分是诈骗罪的重要特点^[21]。若没有被害人的处分行为,无论行为人的欺诈手段有多高明,都无法使欺诈行为既遂^[22]。可见在认定诈骗罪的过程中,处分意识具有重要地位。在诈骗财产性利益的场合,被害人处分意识的程度和内容与诈骗狭义财物存在区别,有必要围绕财产性利益的特征,从被害人视角分析诈骗财产性利益场景中被害人的处分意识。财产性利益作为一种观念上的抽象利益不便于分析,故以债这种常见的财产性利益为例展开对被害人处分意识的讨论。

被害人的处分意识主要围绕对处分对象的认识展开,即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有无认识,以及达到了何种程度。当被害人对于处分财产性利益的认识是完全正确时,当然成立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罪。如上文所举“骗免欠款”例,被害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免除的债务是行为人对他的债务。当被害人对于处分财产性利益完全没有认识时,当然不成立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罪。例如,行为人趁被害人醉酒之际,

借着向被害人讨要签名的名义,让被害人在文件上签字,但该文件实际是免除被害人对行为人债权的文书,被害人因醉酒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其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签的是免除行为人债务的文书。处分意识的内容刻度,正好处于全面认识和毫无认识之间^[23]。对于处分意识的判断,只有按照不同的内容、程度进行综合考察,才能确定被害人是否存在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意识。

(二)判断依据: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与价值

被害人是否对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具有处分意识存在两种值得讨论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被害人对处分对象本身的种类、性质没有产生认识错误,仅在“范围”这一要素上存在认知偏差。以前述“骗免电费”为例,被害人读取的示数是行为人作弊后的小示数,减少的部分示数没有被读取,被害人对于债范围的认识小于实际的范围,基于更小范围的认识作出了相应的处分行为,即只收取小示数部分的电费。在此案例中,被害人对于财产性利益本身的种类、性质没有认识错误,其对于处分对象的认识始终局限于“电费”这一财产性利益。被害人对于已经读取的部分具有处分意识,这点毋庸置疑,但其是否对于作弊部分具有处分意识则存在讨论的空间。有学者认为在被害人查验电表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行为人可能作弊,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对作弊部分的电费应具有概括性的认识^[18]。但此观点较为不妥:一方面,其毫无根据地臆测了被害人的心理;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一般观念,被害人作为抄表员,其本职工作就是按照电表的示数收取相对应的电费,对于作弊部分不存在认识实属正常。而当被害人并没有意识到该部分存在时,则更不可能对其具有处分意识。质言之,被害人对于超出一般认识范围的财产性利益并不存在处分意识,对于超出的部分应当成立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

第二种情形是被害人对处分对象的价值存在认识错误。假设行为人为享受通行费优惠政策,制作虚假的证件、购买不符合运载标准的配件,将其车辆伪装成符合优惠政策的车型,从而在通过高速公路后减少所需缴纳的通行费用。作为被害人的高速公路维护、运营方基于伪造的证件和车型的外观,将原本属于A类的车型误认为为了B类车型,对通行费的多少产生了误判,只收取了B类车型的通行费,而此数额低于A类车型通行费的数额。在该例中,被害人对于“高速通行费”本身的种类、性质没有认识错误,即被害人与行为人均认可通行费是指车辆“通

过这段路程”的费用,只是在数额上因车型而有所区别。被害人明确知道自己处分的是其与行为人之间“高速通行费”这一债权债务关系,收取了不正确的费用。换言之,被害人对于该债本身的认识没有偏差,只是对价值上具有认识错误,价值的多少并不影响被害人“处分该债”意思的真实性。在此情形中,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具有处分意识,成立诈骗罪。

综上所述,诈骗财产性利益场景下被害人的处分意识是连接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行为的关键要素。在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具有处分意识时,才能认为其处分行为是出于自身的意志。在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具有认识错误时,其对于超出的部分不具有处分意识,此情形不成立诈骗罪;在被害人对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存在认识错误时,其对处分对象本身的认识没有偏差,不影响处分意识的真实性,此情形成立诈骗罪。

四、结 语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以债为代表的财产性利益成为常见的利益类型。对诈骗财产性利益行为的规制,需要综合财产性利益本身的特征和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处分意识,方能作出全面且正确的认定。从我国《刑法》对于财产的保护、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可以明确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鉴于财产性利益是观念上的利益,在占有转移方面与狭义财物存在差异,需凭借物理管理可能性区分二者。在此基础上,亦可进一步说明部分原权之债属于财产性利益。在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语境下,被害人处分行为呈现出利益转移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债权债务的形成、转移和消灭。在处分意识层面,当被害人对处分对象的范围具有认识错误时,对于超出范围的部分被害人不具有处分意识,进而不能成立诈骗罪;当被害人对处分对象的价值具有认识错误时,其对于处分意识的真实性没有影响,能够成立诈骗罪。

参考文献:

- [1] 周光权. 刑法各论[M]. 4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104.
- [2] 张明楷. 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J]. 法学,2015(3):12-25.
- [3] 张明楷. 外国刑法纲要[M]. 2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33.
- [4] 李强. 财产犯中财产性利益的界定[J]. 法学,2017(12):37-51.
- [5] 王钢. 德国判例刑法:分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4.
- [6] 付立庆. 再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梳理与回应[J]. 政治与法律,2021(8):44-56.
- [7] 郑泽善. 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J]. 北方法学,2013,7(4):100-109.
- [8] 邓毅丞. 财产性利益的界定标准体系重构:以利益转移罪的认定为中心[J]. 当代法学,2022,36(5):74-86.
- [9] 张明楷. 刑法学:下[M]. 6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303.
- [10] 陈洪兵. 不法交易与诈骗罪[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8):38-43.
- [11] 黄茂荣. 债法总论:第一册[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8.
- [12] 朱庆育. 民法总论[M].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61.
- [13] 王泽鉴. 债法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7-58.
- [14] 马卫军. 论诈骗罪中的被害人错误认识[J]. 当代法学,2016,30(6):57-68.
- [15] 崔建远. 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上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45.
- [16] 王泽鉴. 民法物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2.
- [17] 王钢. 盗窃与诈骗的区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第27号指导案例的展开[J]. 政治与法律,2015(4):28-48.
- [18] 孙运梁. 财产性利益诈骗中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以债的诈骗为中心[J]. 政治与法律,2023(3):67-80.
- [19] 陈兴良. 刑法各论精释:上[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433.
- [20] 刘明祥. 论诈骗罪中的交付财产行为[J]. 法学评论,2001(2):66-72.
- [21] 高铭喧,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501.
- [22] 车浩. 从华南虎照案看诈骗罪中的受害者责任[J]. 法学,2008(9):51-60.
- [23] 山口厚. 刑法各论[M]. 王昭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9.

(责任编辑:秦红嫒)